

地方性视角下历史城镇传统手工业空间演变与保护发展研究*——以平遥推光漆器产业空间为例

Evolutio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Space in Historic Tow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ness: A Case Study of Pingyao Hand-polished Lacquerware Industrial Space

邵甬 潘妍涵 SHAO Yong, PAN Yanhan

摘要 传统手工业空间是历史城镇活态遗产的核心载体,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行适应性演变以保持产业活态,但目前其演变机制与保护策略尚未形成系统性研究框架。基于“地方性”理论视角,构建“物质空间—手工业活动—地方意义”分析框架,以平遥推光漆器产业空间为例,揭示其从清代作坊到现代产业集群的演变特征:产业模式从单一生产向文旅融合转型,空间布局从城内集聚向城乡网络扩散,地方认同从工匠群体向多元主体扩展。研究发现,外部结构性动力(如政策变化、旅游化)通过重塑产品定位及价值,隐性主导空间变迁,而地方主体(工匠、政府、资本)通过适应性实践塑造产业韧性。基于此,提出推动产业创新以适配当代需求、促进空间活化与规划整合、强化在地人才培养与外向文化辐射3个建议,为历史城镇活态遗产保护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

Abstract As the core carrier of living heritage in historic towns, traditional handicraft space will keep adapting and evolving with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o keep the industry alive, but at present its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conservation strategy have not yet formed a systematic research framework.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cenes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aterial space - craft activity - local meaning”. Taking Pingyao hand-polished lacquerware industry as a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reveals its evolution from Qing Dynasty workshops to a modern industrial cluster, characteriz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form from craft-exclusive operations to cultural-tourism integration, the diffusion of spatial configuration from intra-city agglomeration to urban-rural network, and the expansion of local identity from artisan groups to pluralistic subjects. It is found that external structural dynamics (policy changes, tourism-driven transformation) implicitly dominate spatial changes through the reshaping of product positioning and value, while local stakeholders (artisans, government, capital investors) strengthen industrial resilience through adaptive practices. Building upon this analysis, three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promoting industrial innovation adapted to contemporary demands, advancing spatial revitalization and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boosting local talent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impact,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paradigm and actionable pathway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living heritag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in historic towns.

关键词 传统手工业空间;地方性;历史城镇;平遥推光漆器;演变特征

Key words traditional handicraft space; placeness; historic town; Pingyao hand-polished lacquerwar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6) 03-0105-09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 supr. 20260315

作者简介

邵甬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遗产保护与文化复兴研究院 院长
nyshao163@163.com

潘妍涵

上海市数字城市规划研究中心 助理工程师,硕士
上海市量子城市空间智能创新重点实验室(筹)
成员

0 引言

历史城镇是传统时期工商经济的载体,普遍孕育过一定形式和规模的传统手工业。传统手工业产生并发展于古代自然经济形态和传统社会环境,具有鲜明的地方适应性及手工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中国城镇历史文化街区谱系与价值研究”(编号23VJXT019)资助。

操作特征,是重要的地方经济及文化构成部分。在当今同质化旅游开发模式消解地域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以传统手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成为重塑城镇特色识别度与经济韧性的重要资源。

手工业空间是手工业活动的载体,其空间布局及功能形态与生产工序、贸易要求及从业者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并通过动态调整实现与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历史城镇中的手工业空间是融产业、空间、文化与社区于一体的遗产复合体,其核心关切并非单纯盈利,更需回应如何协同遗产保护、产业振兴与社区延续,在现代化进程中永续“活”下去的问题。以历史城镇的手工业空间为研究对象,可从城乡遗产保护视角整体把握产业与空间演变机制,理解其当代转型逻辑,探索历史城镇活态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相融合的实践路径。

“地方性”是文化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强调地方作为动态演进系统,其特性建构依赖于地方主体实践及外部网络交互的双重机制。本文基于“地方性”视角,构建历史城镇手工业空间分析框架,并以平遥推光漆器产业空间为例,探究其演变特征及影响机制。平遥古城作为人居型世界文化遗产,是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共生的典范^[1],其中平遥推光漆器是古城中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业,其适应性演变与古城历史变迁紧密关联,并在当代发展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为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

1 理论背景与分析框架

1.1 地理学中的“地方性”理论及其应用

1970年代,人文主义学派首先将“地方”概念引入地理学,侧重以人的主观性视角研究“地方”。段义孚^[2]强调人与特定地方的情感联系,认为“地方是人类生活行为的载体,能给予安全感和身份感”,而“地方性是人们赋予空间的意义”。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则强调人与地方的心理联结源于生活经历,地方性通过社会活动在环境中的投射而得以形成。

1980年代末,经济地理学界的结构主义学派亦开始研究“地方性”,将其视为地方在外部社会经济联系中被赋予的特定角色。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主张地方性源于资本积累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均衡发展”(uneven development);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则进一步强调地方需依赖外部世界建构,其本质是开放、动态、具有丰富内部差异与社会关系的实体^[3]。

人文主义地理学和结构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揭示了地方性形成的内生与外生机制。艾伦·普雷德^[4]尝试结合两者观点,提出了“结构—行为—地方”三重分析框架,主张结构性制度与个体实践对地方塑造的共同作用,并强调“地方”具有动态流变的时间属性。总结而言,地方性可以被定义为将一个地方与其他地方区分开来的^[5]、特定时间与空间跨度中的地方特征,通过在地实践与区域间交互,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6]^[105],并随着时间呈现出动态变化。在现实世界中,内生、外生两种机制常共同推动着地方性的形成。

在遗产保护领域,“地方性”为研究历史城镇、街区中人与遗产的互动关系及情感联结等^[7]提供了重要视角。研究一方面聚焦于对地方性要素特征的识别测度,如特色场所、传统节庆活动、生活方式等,并基于此构建保护更新策略^[8-9];另一方面则关注旅游与商业开发等现代化冲击下的地方性变迁,揭示多元主体在地方性生产中的建构机制^[6]^{[11]-[14]},^[10]。在产业发展研究中,“地方性”视角强调整合地方自然资源、文化符号、社会网络、集群生产模式等要素,构建差异化的竞争优势^[11]^[8-16],^[12]^[380],^[13],并证实了本土产业复兴可反过来促进文化景观更新、生活方式转型及地方形象重塑,推动可持续发展^[11]^[8]。

目前现有研究对历史城镇传统产业空间的探讨仍显不足。当前成果多集中于手工业主导型村落,侧重于空间的演变特征、“产业—空间”的联动机制^[14]或演变中的“社会—空间”关系研究^[15],对典型专业城镇的手工业空间(如景德镇^[16]、江南古镇^[17])则

偏重于物质形态分析及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探究,对其功能演化与空间适应性转型研究尚不充分,对空间多维价值及地方资源系统整合路径的深入探讨仍有待补充。

1.2 “地方性”视角下历史城镇传统手工业空间分析框架构建

人文地理学者雷尔夫认为地方性由相互关联的3个要素组成:物质的特征与外观、可见的活动和功能,以及意义与象征^[18]。3个要素彼此交织,而地方性正是在物质空间的独特性、社会经济功能的特殊性、主体情感认知的差异性中得到递进性表现。综合雷尔夫及Zhang^[11]^[17]、杨槿^[12]^[375-376]等学者观点,本文尝试提出地方性视角下的历史城镇传统手工业空间的定义:根植于地方手工业生产实践、具有物质功能属性、有助于塑造地方认同与依赖的空间体系。围绕产品增值进行的本地手工业生产实践投射在物质环境上即为传统手工业空间,而手工业空间又以实体容纳功能活动、凝聚记忆情感,推动地方认同的形成与强化。因此,地方性视角下历史城镇传统手工业空间的研究要素需要由物质空间拓展至手工业生产实践与地方意义(见图1)。

手工业活动的开展以产品的价值增值为目标,包括生产、销售及相关的生活及文化活动等,依托物质空间进行,并推动着物质空间的变迁和地方情感意义的建构。物质空间是历史城镇中承载手工业活动的基础载体,既包括反映手工业生产组织的总体布局结构,也包括微观层面上手工业活动所需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功能空间,受到地域建筑规制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地方意义源于人与传统手工业空间的互动经验和情感联结,本文认为地方意义包含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前者指个体与手工业空间的功能性联结,如作为工作与生活场所;后者则是群体对其产生的情感偏好与文化身份认同。

手工业空间变迁受外部结构性动力和地方主体行动双重影响。外部结构性动力指来自

外界的宏观政治经济格局调整所带来的结构变动,如政策制度变迁、工业化、现代化、旅游化浪潮等^[19],通常作用于产品价值与定位,并最终传导至空间布局与形态上。地方主体行动则来自个体力量如当地手工业者、地方政府、民间组织、投资者等,通过推动产品增值的行动实践,影响手工业空间的分布、使用与更新。外部结构性变迁与内部主体行为实践之间周而复始的转化过程推动空间产生变化^[20],其改变具有延续性。

2 平遥推光漆器产业空间的演变过程

平遥推光漆器产业伴随古城历史演进呈现动态发展(见图2)。本文选取清代至民国(产业空间正式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平遥古城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下文简称“古城申遗”)前(生产模式转变)、古城申遗后至今(产业规模化发展)3个时间连续、手工业产品定位变化及产业空间呈现明显差异的阶段进行历时性比较。

2.1 清代至民国:商贸经济带动下推光漆器产业空间形成

2.1.1 日用品及贸易商品生产的私营作坊自发分工模式

平遥漆器产业的兴盛与商贸经济发展紧密相连。明朝中叶后平遥的市场体系已渐趋完备,清代抚商政策、经济政策及国际商路的开通进一步推动了商贸业发展,催生了漆器业的繁荣与专有产业空间的形成。乾隆时期,平遥商人融合福建漆艺与本地漆艺,创制出独特的推光工艺。随之,城内出现了首家专营的平遥漆器铺,且漆器生产分工细化,胎骨、生漆、熟制漆、油胚、色料、金箔及铜饰件等均由专门作坊提供。至同治光绪年间,平遥城内已有漆器铺19家,漆器工匠300余人,另外还有一家漆店、铜匠铺、金店、木器行、皮箱铺等^[21]。平遥推光漆器广泛融入日常生活,常见于隔扇、匾额、神龛及首饰盒、漆盘等器物,并依托晋商贸易网络远销俄国、东南亚等地。至民国初年,漆器手工业仍以私营作坊为主,未向规模化工

场转型。日军侵占平遥后,手工作坊大规模歇业,以小规模、分散化作坊为主导的漆器生产体系在动荡环境中迅速衰退。

2.1.2 城东手工业集聚格局及“前店后坊”的商铺形制

这一时期推光漆器产业空间的分布与古城的商业格局密切相关。清代平遥古城形成了“干”字形的商业街格局,其中东大街既是主要商业街,又因其连接城外东关商品集散地及城内的重要位置,成为京陕官道的必经之路。推光漆器及相关的的手工业作坊沿东大街聚集,而城东仓巷、砖圈门巷成为金银铜器作坊区,与主要商业街及运输通道相连的郭家巷、沙巷、站马道等亦有手工作坊分布,形成了古城东部手工业聚集、并沿主要街道向外延展的空间格局(见图3)。

在空间形态上,漆器产业多依托传统合

院建筑,延续“前店后坊”或“前店后宅”的传统商业建筑形制(见图4),临街设店面,庭院作为大漆晒制搅拌、木胎制灰刮灰等粗加工空间,而描金彩绘等精细工序多在厢房内完成。后院可直通街巷便于货物运输,形成销售、生产及生活三位一体且互不干扰的空间体系。

2.1.3 城乡人员流动与记忆空间塑造

这一时期,推光漆器业以手工作坊经营为主,其高收益吸引了周边乡村人口入城学艺,推动了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多数漆器铺均设有居住功能以适应学徒住宿需求。该产业亦深刻塑造了古城的物质空间与社会记忆,如平遥漆商冀斗龙家族凭借漆器出口成为地方巨富,所营建的宏大宅邸“冀氏大院”与因漆器商贸活动得名的“站马道街”,共同成为推光漆器产业昔日繁荣的重要象征,亦是产业资本向实体空间转化的直接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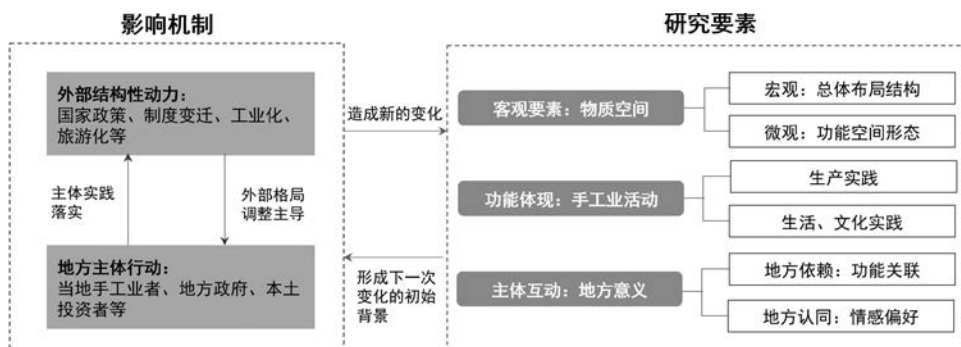


图1 地方性视角下传统手工业空间演变分析框架

Fig.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space in historic tow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nes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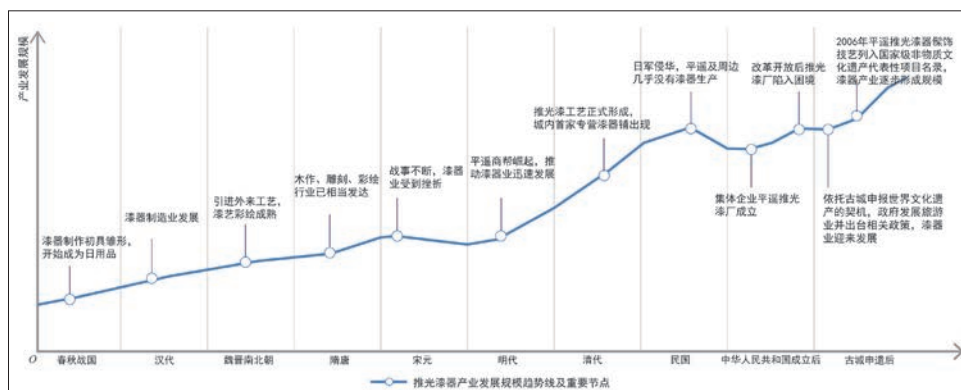


图2 平遥推光漆器产业的发展历程

Fig.2 The history of Pingyao hand-polished lacquerware indust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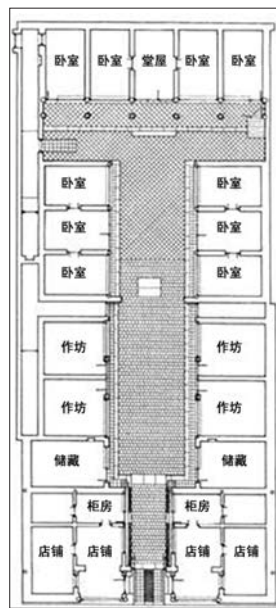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清末推光漆器及相关产业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and-polished lacquerware and related industr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永隆号漆器铺空间功能

图4 漆器铺空间示意图

Fig.4 Lacquerware shop space

资料来源:图a改绘自宋昆.平遥古城与民居[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0;

图b拍摄自平遥人闫照吾绘制的《平遥古城盛世商贸图》。



b 闫照吾绘制的清末民初古城中的漆器铺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古城申遗前: 计划经济体制下推光漆器产业空间的 转变

2.2.1 工艺品出口创汇的集体化生产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遥手工业生产逐步恢复。1958年,伴随着平遥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改造,集体企业“平遥工艺品推光漆合作工厂”在城内东大街成立,并聘请老手艺人进厂带徒、研发新工艺,漆器产品种类迅速增至30余种,生产模式也逐步转向流水线作业的现代工厂模式。

1964年,平遥漆器参展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获得外商赞誉,并迅速打开国际市场,其定位从日常用品和传统贸易品逐步衍生为国家创汇工艺品。1979年,推光漆器被国家轻工业部评为优质产品。1983年,平遥推光漆厂被国家外贸部确定为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漆器年均出口额达40万元(当年平遥县外贸销售年平均销售总额约为1 000万元),产品远销北美、欧洲及东南亚地区,并于1987年跻身全国漆器行业五强企业。至1990年,推光漆厂共有职工293人,年总产值210万元,其中出口产值

达105.3万元,占比超过50%,产品销售收入为187.3万元,品类涵盖传统工艺品、民用家具和旅游纪念品等千余种。这一时期,出口业务成为推光漆厂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柱(见图5)。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受低价工业品冲击与产权改革滞后的双重影响,推光漆厂经营难以为继,并于2004年被拍卖。这一历程映射了集体手工业在市场化转型中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2.2.2 城外西关工厂布局及流水线生产空间

这一时期,为适应现代工业化生产,推光漆厂于1975年迁至城外交通便利且工厂集聚的西关(见图6),建设了占地2万m²的厂区。为满足出口创汇的规模化生产需求,厂区依据工艺流程进行了系统功能分区,整合30余道工序,设置漆工、木工、画工、灰胎、雕刻、铜工等专业车间,并配套设计室、图纸室、包装组、烤窑及阴房等辅助技术空间,同时配套了办公室、会议室、食堂、职工宿舍、客房等管理与生活服务设施,形成了集生产、管理、生活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空间。

2.2.3 空间记忆锚点及地方身份认同塑造

这一时期,平遥县政府主导成立集体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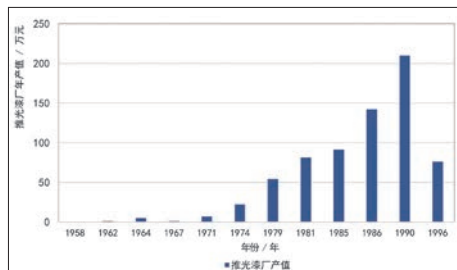


图5 平遥推光漆厂年产值

Fig.5 Annual output value of Pingyao hand-polished lacquerware factor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2]281-282。

光漆厂,实现了生产模式的转型,并通过明确的出口创汇定位驱动了产业发展与品牌提升。推光漆厂通过公开招考与熟人引荐两种途径扩大从业群体,并依托工会、文工团等组织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形成了以工厂为单位的文化活动现场,使厂区超越了单一生产功能,成为承载地方记忆的空间锚点。

推光漆厂在国家级赛事中屡获殊荣,不仅推动了地方品牌的建立,更塑造了工人“厂兴则地荣”的共同体意识。“我们厂在正月十五的灯会闹得特别有名。厂里自己制作狮子、龙灯,还有高跷、彩车、绣球等,薛(生金)

老师做大的部件,我们帮他的忙。过节的时候我们也组织游行。”“原来我们都是爱厂如家,没有私心的。”“我们厂原来是十三家重点出口厂之一,获得了代表国家最高荣誉的金杯奖。推光漆厂倒闭后就让一个太原人把厂子买了下来。我们原来经营得很好的工厂,一个星期就被夷为平地,太可惜了!”^①老工人的口述记忆不仅印证了推光漆厂对地方身份认同的塑造作用,也完整体现了地方意义从建构到解构的动态过程。

2.3 1997年至今:旅游推动下推光漆器产业空间的多元拓展

2.3.1 文旅融合的多元开发模式

1994年,为配合古城申遗准备工作,县政府主导进行南大街业态更新以恢复明清商业街风貌,通过修缮公房并推行租金减免等政策,鼓励民营资本入驻。在此契机下,原推光漆厂厂长张锦于“永隆号漆器铺”旧址创办漆器艺术博物馆,带动多家个体漆器铺入驻南大街,为古城申遗成功后推光漆器业随旅游发展

而复兴奠定了基础。

2006年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后,平遥推光漆器成为重要的地方文化符号,漆器产业逐步形成规模,形成了分层的生产组织体系,古城内形成了对标高价精品的大师工坊、中高端漆器生产的产业园,以旅游商品为主的家庭作坊、工厂和分销店铺等多类产业空间,并成立了平遥推光漆器协会等机构以保护、传承和创新推光漆技艺,部分龙头企业还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与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此外,推光漆器产业借力文旅融合,通过展览、文创、研学等形式,拓展了产品体系与产业链条。

据平遥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资料统计,2018年末,平遥全县从事平遥推光漆器生产经营单位近140个,其中具有木胎、漆胎、髹饰等各工序的生产加工单位40余个。至2022年,全县相关单位增至160余个,从业人员达5 600余人,约占全县总就业人数的6%,年加工漆器约30万件,实现销售收入6 200余万元,其中

规模较大的12家企业占比达60%,头部企业平遥唐都推光漆有限公司销售收入占总量一半,行业集中度较高。2022年9月,平遥县凭借平遥牛肉和推光漆器入选山西省首批特色专业镇,带动行业显著增长。至2023年推光漆器行业及相关产业链产值达4.3亿元、销售额达3.5亿元,已远超过同年平遥县旅游门票收入1.4亿元^②,体现了其作为地方特色产业的经济价值。

以“天眼查”网站中的企业数据进行补充分析,从1999年到2022年,平遥县内注册推光漆器生产经营单位的数量不断上升,近10年增速明显(见图7),分散个体经营仍然是目前平遥推光漆器产业的主要形式,占有生产经营单位总数的84%。

2.3.2 以古城为中心向外围扩散的空间布局及复合型功能空间

推光漆器产业空间呈现出集中于古城主要街道、以古城为中心向外围镇区及村庄扩散的布局。受1981年平遥“新旧分离”规划影响,漆器产业空间在城内沿原“干”字型商业街集聚,并由东大街及东南门头街经城门延伸至城外上、下东关大街等生活性街道,保障了产品及原料的运输流通效率。产业核心集聚区位于古陶镇范围内,周边村庄仅零星分布3—6家,远郊村庄多为1—2家。产业空间分布呈现出时序性(见图8):南大街由于旅游业开发,集聚了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产业空间,其次为城内其他商业街道。2015年后,城外漆器单位数量增长且逐步向外扩张,体现出古城对外围镇村的辐射外溢。

这一时期,推光漆器的多元类型产业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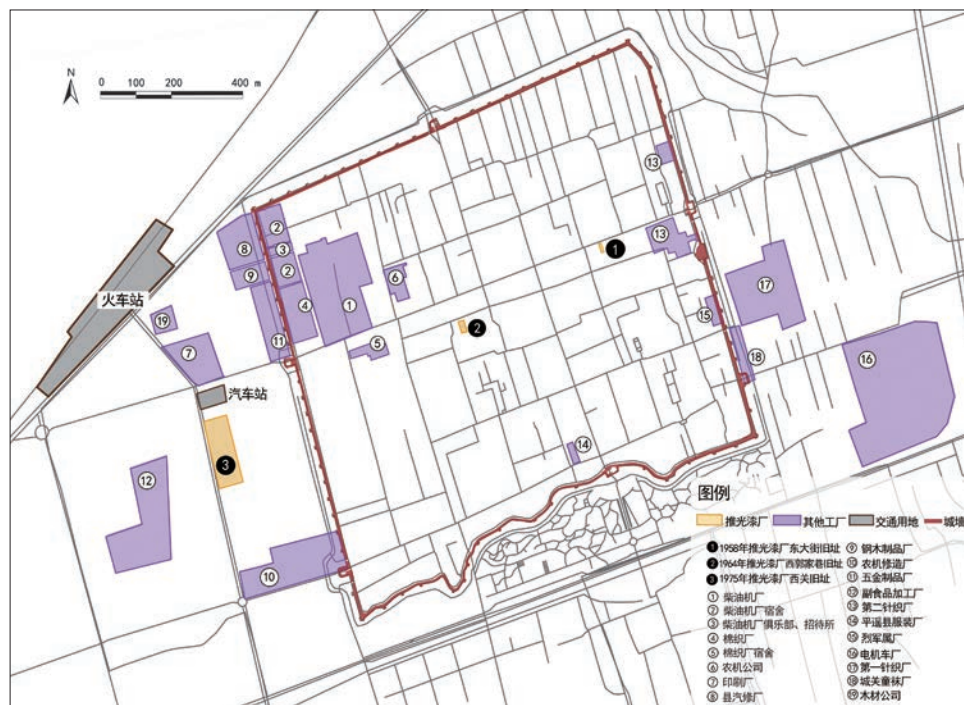


图6 1950年代—1990年代推光漆厂及其他工厂在平遥的空间分布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and-polished lacquerware factory and other factories in Pingyao from the 1950s to 1990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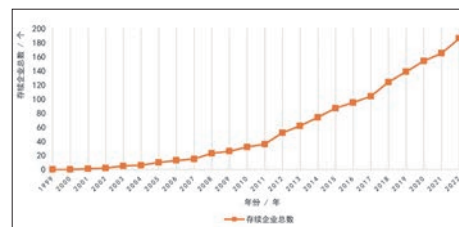


图7 平遥推光漆器注册企业的数量变化

Fig.7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enterprises of Pingyao hand-polished lacquerwar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释: ① 引用自2023年3月对平遥推光漆髹饰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梁中秀的访谈。

② 平遥县推光漆器年产值、销售收入及旅游门票收入等数据来源于平遥县工业和信息化局2022、2023年年度工作总结和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

间在布局上呈现出不同特征（见图9），并出现了与旅游销售、文化展示、研学服务相结合的复合功能空间形态（见图10）。古城更新也为推光漆器产业提供了更多空间载体，形成了传统商铺建筑植入漆器展示功能、传统民居院落与推光漆器家庭作坊相结合、原有

厂房空间改造文化产业创意园等更新利用方式。

2.3.3 地方产业集群形成及新文化景观出现

这一时期，政府、本地资本、手工业者、技术学校等多元主体共同推动了漆器业的发展：当地政府为产业空间多元化发展提供了

战略引导和政策保障；社会手工业者自发进行产业空间建设拓展与功能创新；本地资本极大助力了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校园通过校企联合模式支持手工业人才培养。漆器产业逐渐形成地方集群，依托文化背景、历史传承、语言环境、本土优惠政策等，加强了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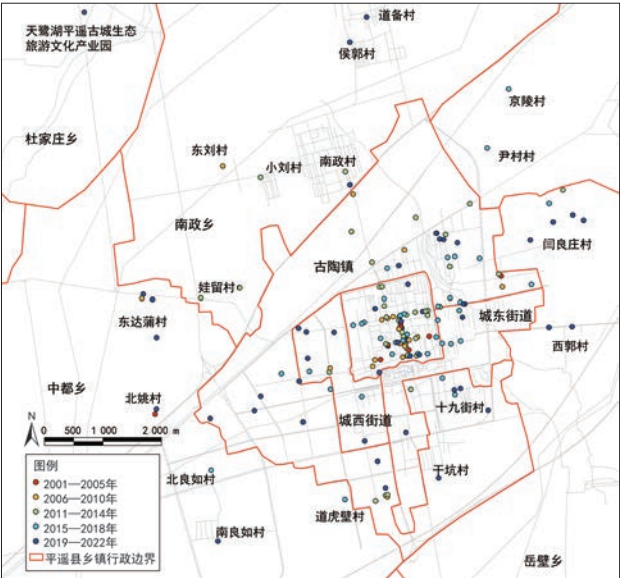


图8 不同注册年份推光漆器企业的空间分布
Fig.8 Distribution of hand-polished lacquerware enterprises by year of incorpor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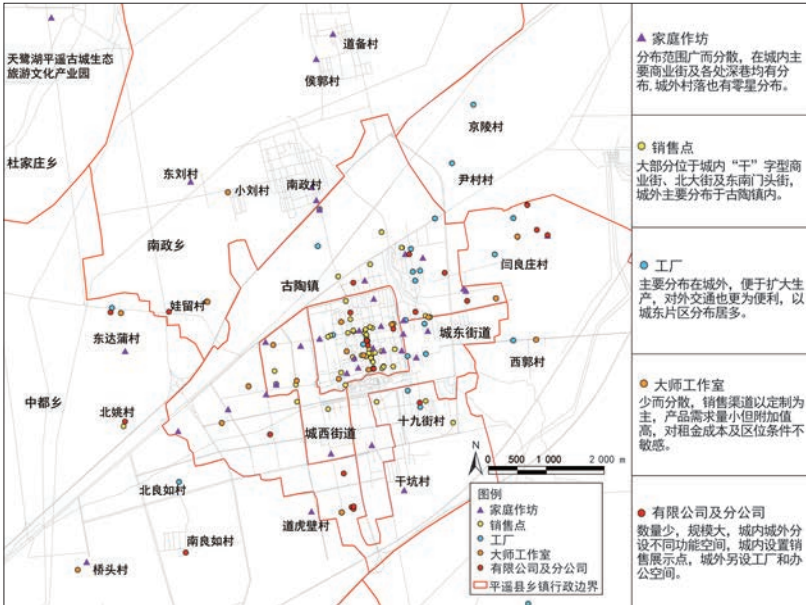


图9 各类推光漆器产业空间分布特点
Fig.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hand-polished lacquerware industrial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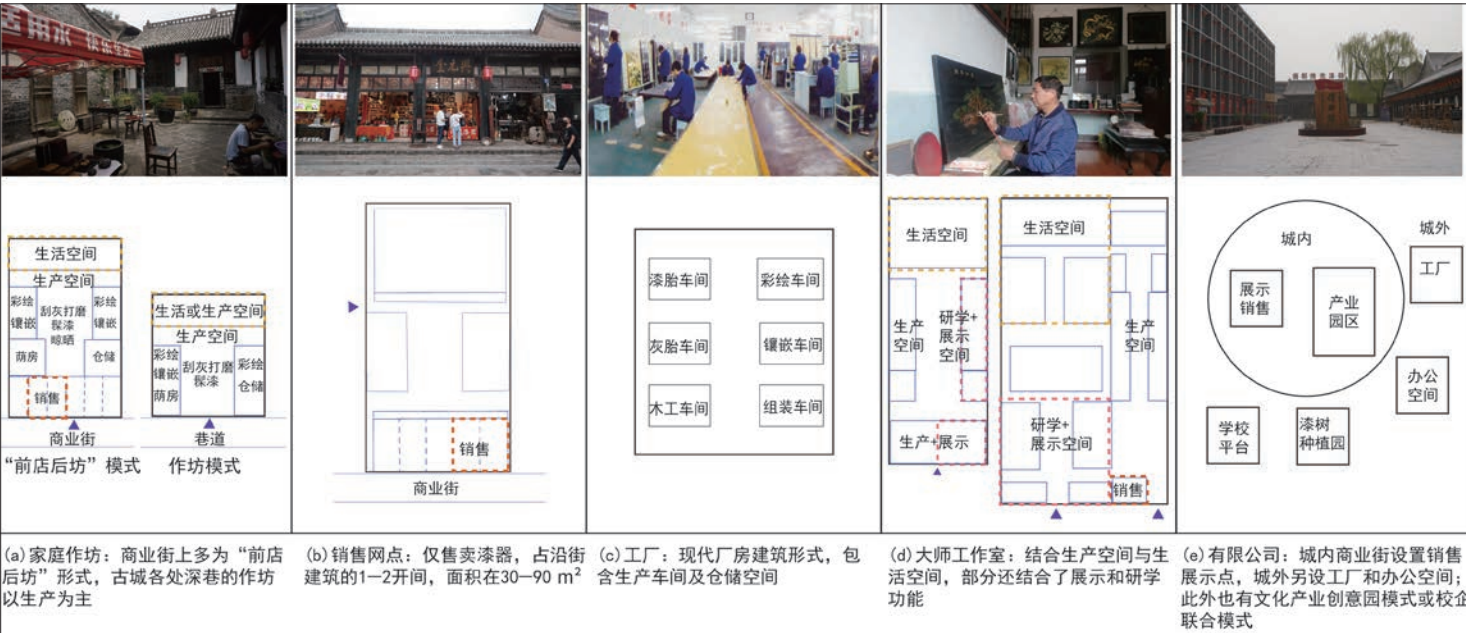


图10 各类推光漆器产业空间模式特点
Fig.10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various types of hand-polished lacquerware industrial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就业依赖性,同时也推动了地方文化复兴和品牌建设。平遥县于2015年获评“中国推光漆器之都”,2022年入选山西省重点专业镇,并于2020年和2023年先后出台《平遥推光漆器技术规范》与《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保护条例》,为产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同时,通过持续举办漆文化艺术节、中国漆艺文化博览会等活动,古城内衍生出新的文化景观,进一步扩大了推光漆器的影响力,也推动了如平遥推光漆器文化产业园等新文化节庆场所的形成,通过空间载体的转型实现了地方认同的再建构。

3 平遥推光漆器产业空间的演变特征及影响机制

3.1 演变特征

平遥推光漆器的生产变迁展现了从实用品向文化符号的演变历程。从传统时期侧重使用价值的日用商品,到计划经济时期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工艺品,再到如今成为承载地方文化的旅游纪念品与高端工艺品,其核心属性与附加值实现了逐步提升。这一过程中,其生产组织模式也随之变化,经历了从家庭作坊、集体化生产,再到“家庭作坊+公司”的结构性演进,业态也由单一的手工业生产,转变为集旅游观光、文化体验与创意设计于一体的多元融合模式,实现了产业链的纵深延展。

平遥推光漆器的产业空间布局从城内集聚向城乡网络扩散转变。其手工业空间最初集中于古城东部,随着规模扩大逐步向城外迁移,最终形成以古城为核心、沿主要道路向外围镇区和村落扩散的网络化格局。在功能空间形态上,从早期的“前店后坊”式产销一体,演进为工序分明的流水线,再到融合生产、销售、文化展示与研学体验等功能的复合型空间,充分发挥了推光漆器手工业的多维价值,从而回应了产业的现代化发展需求。

平遥推光漆器产业的地方认同逐渐向多元主体扩展。其社会关系网络从基于血缘、亲

缘的传统封闭网络,转向以业缘为核心的现代开放网络。政府、资本、学校等多元主体的介入,不仅扩大了主体范围,推动了产业地方集群的形成,同时也增强了就业的地方依赖性,平遥推光漆器逐渐成为重要的地方文化符号,并依托节庆活动提升辐射力,同步强化了地方内外的认同感。

3.2 影响机制

外部结构性动力通过改变大环境下手工业活动与更广阔区域的生产联系,主导了推光漆器产品定位与产业空间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过程呈现出清晰的传导机制:市场环境变化—产品价值重构—空间形态响应。从清代依托晋商网络的“产销一体”,到计划经济时期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国家计划生产,再到古城申遗成功后受旅游经济驱动而走向功能复合的多元融合,产业空间形态始终是对外部结构性条件的适应性体现。

地方主体的能动实践是驱动空间演变与意义再生产的关键力量。从依靠地缘、血缘网络的传统漆器商人与手工匠人,到集体化时期组织化生产的工厂与工人,再到古城申遗后政府、资本、手工匠人、学校等多元主体,在演变的3个阶段中,地方行动者通过其策略性行动,推动产业空间在保留原有社会关系、产业文化和空间需求等的基础上进行战略性的再建构,在维持相对稳定特征的同时,不断强化人与空间的地方性关联。在此过程中地方主体实现了多元化及能力跃升,而推光漆器产业也通过空间的消解与重构,驱动地方认同的动态解构与再建构。

4 地方性视角下历史城镇传统手工业空间的保护发展策略

当前,平遥推光漆器产业仍面临产品附加值低、行业集中度过高、同质化竞争突出、产业空间分散、创新载体不足等现实挑战。为实现其可持续保护与发展,应立足于“地方作为开放动态系统”的认知框架,强化各类地方主体的能动作用,促进内外资源联动。具体可从

推动产业创新适配当代市场、整合活化产业空间、构建在地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系统提升手工业的地方资源价值,并通过外向辐射强化文化认同,构建“内生韧性—外向联动”的发展路径。

4.1 推动适应当代需求的产品创新探索

平遥推光漆器产业在演进中始终呈现对市场需求的动态响应。在保护与发展中,需要立足核心技艺传承,不断提升与当代需求的适配度,深化多元产业融合。在创新机制构建方面,可在现有推光漆器协会等行业机构的基础上,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人才培育机构、工美公司等方面资源,组建专业的运营组织,统筹工艺档案化保护、技术研发、市场分析、产品开发与营销推广等环节,基于当代需求推动产品创新。同时,应积极发挥地方中小企业手工业者的主体力量,依托青年手工业者创新实践基础,推行孵化项目,通过划定政策区、给予房屋租金及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创新创业活动,打造多元化的产品展示交流平台及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在产业多元融合方面,应深化文旅协同,通过构建跨业态的文化观光模式以凝聚合力,同时强化创意赋能,将手工业元素融入文化教育、影视传媒、会展服务等多领域,提升推光漆器作为古城文化符号的认知度,实现产业结构的在地化升级。

4.2 物质空间活化更新及产业布局整体规划

为推进平遥古城手工业空间的保护与更新,需从认知构建、空间更新与产业布局规划3个方面制定系统策略。一是完善地方性认知体系。当前对古城手工业空间的整体认知仍存在空白,应通过方志整理、口述史采集等方法,整合老字号、工匠家族及文化场所信息,建立“百工档案”,为空间保护提供历史依据。二是实施分类化更新策略。在延续传统街巷肌理、风貌特征、建筑形制及特色历史功能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发展需求,对闲置院落、厂房等空间进行活化利用。可优先在城内公有产权院落、大型公共空间

等植入创意孵化、文化展示等功能,形成示范节点,带动片区自主更新。三是构建“点—轴—网”产业空间结构,以系统引导手工业空间有序发展。在轴线层面,强化东大街作为手工业历史轴线的功能,活化沿线院落,提升空间连续性;在节点串联层面,整合重要手工业节点,构建“晋工百艺”文化线路,并可融合商贸、工业遗产等主题拓展观光路径,系统呈现古城产业图景(见图11);在网络层面,形成“古城核心区—周边街道—邻近村落”3级布局结构,联动城外平遥会展中心打造展示核心,推动周边手工业工坊、文创工作室的空间集聚与资源整合。

4.3 建立“地方人才培育—外向文化辐射”的认同强化机制

历史城镇手工业空间的可持续发展与更新,关键在于建立在地人才培育与外向文化传播的协同机制。一方面,应确立手工业者作为

空间实践主体的核心地位,构建多层次培养体系:通过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设立专项研习基金与培训项目等政策机制,重点培养青年后备力量;以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补贴激励企业技术升级与品牌建设;通过开放工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等遗产教育形式,增强社区认同,培育本土文化传承土壤。另一方面,通过打造节庆IP、举办周期性文化事件与学术研讨会、艺术家驻地等项目,形成稳定的研究、创作、展示生态,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深化公众的地方认同。

5 结语

地方性视角为历史城镇手工业空间的演变提供了动态、开放性的研究框架,不仅关注物质空间的形态特征,更延伸至对地方性生产实践与主体网络的系统考虑,进而揭示在地方主体实践与外部结构性变迁双重作用下地方性的持续再建构过程。基于此,可构建“内生

韧性—外部联动”的手工业资源保护模式,通过适配当代需求的产品价值增值创新、物质空间的活化更新与系统布局、多层次的人才培育体系构建,增强产业韧性,同时借力外部变化推动地方差异性品牌构建与文化宣传,最终实现历史城镇活态遗产保护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协同赋能。

(诚挚感谢平遥县文旅局文旅发展中心霍文忠主任、平遥推光漆髹饰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梁中秀先生、平遥本土文化研究者邓晓华先生为本研究调研与文稿撰写提供的诸多支持。)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邵甬,胡力骏,赵洁,等.人居型世界遗产保护规划探索——以平遥古城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6(5):94-102.
SHAO Yong, HU Lijun, ZHAO Jie, et al. A research on the conservation plan of the human-habitat world heritage: case study of Pingyao Ancient City[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6(5): 94-102.
- [2]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M]//GALE S, OLSSON G. Philosophy in geography. Dordrecht: Springer, 1979: 387-427.
- [3] 钱俊希,钱丽芸,朱玆.“全球的地方感”理论述评与广州案例解读[J].人文地理,2011,26(6):40-44.
QIAN Junxi, QIAN Liyun, ZHU Hong.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J]. Human Geography, 2011, 26(6): 40-44.
- [4] PRED A. Place as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process: structuration and the time-geography of becoming place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4, 74(2): 279-297.
- [5] 周尚意,杨鸿雁,孔翔.地方性形成机制的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分析——以798和M50两个艺术区在城市地方性塑造中的作用为例[J].地理研究,2011,30(9):1566-1576.
ZHOU Shangyi, YANG Hongyan, KONG Xiang. The structuralistic and humanistic mechanism of placeness: a case study of 798 and M50 Art District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9): 1566-1576.
- [6] 白凯,胡宪洋,吕洋洋,等.丽江古城慢活地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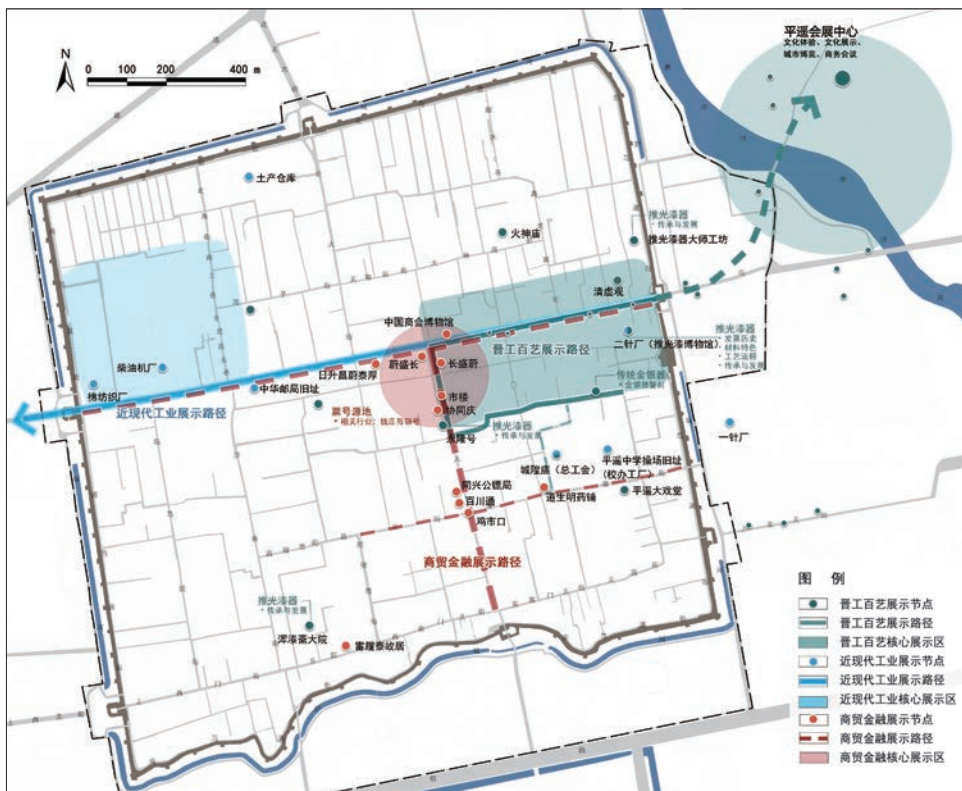


图11 基于平遥产业发展线索构建主题展示路径

Fig.11 Constructing themed exhibition routes based on Pingyao'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的呈现与形成[J]. 地理学报, 2017, 72 (6): 1104-1117.
- BAI Kai, HU Xianyang, LYU Yangyang, et al. Study on the identity with placeness of slow living in Lijiang[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6): 1104-1117.
- [7] LOW S M, ALTMAN I. Place attachment[M]//ALTMAN I, LOW S M. Place attachment. Boston, MA: Springer US, 1992: 1-12.
- [8] 司洁, 李欣鹏, 薛靖裕, 等. 基于地方性视角的历史街区商业化程度量化研究——以西安市北院门历史街区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9, 26 (7): 107-113.
- SI Jie, LI Xinpeng, XUE Jingyu, et al.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of the commercialization degree of historical district in the place perspective: taking the Bei Yuan Men historical district of Xi'an City as an example[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9, 26(7): 107-113.
- [9] 曾卫, 郑传乔. 基于地方理论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究——以《汉源县九襄镇民主村保护发展规划》为例[J]. 中国名城, 2021, 35 (8): 88-93.
- ZENG Wei, ZHENG Chuanqiao.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place theory: taking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 of Minzhu Village, Jiuxiang Town, Hanyuan County* as an example[J]. China Ancient City, 2021, 35(8): 88-93.
- [10] 姜辽, 苏勤. 旅游对古镇地方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周庄的多案例考察[J]. 地理科学, 2016, 36 (5): 766-771.
- JIANG Liao, SU Qin. The impact of tourism to placeness in ancient town: multiple cases in Zhouzhuang[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5): 766-771.
- [11] ZHANG X, LI Y, LIN J, et al.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ness in traditional handicraft heritage sites: a case study of Suzhou embroidery[J]. Sustainability, 2021, 13(16): 9176.
- [12] 杨瑾, 徐辰, 朱竑. 本土产业发展视角下的乡村地方性重构——基于阳美玉器产业的文化经济地理分析[J]. 地理科学, 2020, 40 (3): 374-382.
- YANG Jin, XU Chen, ZHU Hong. Placeness reconstruc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ocal industry: a cultural economic geographical study of the jade ware industry in Yangmei Villag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3): 374-382.
- [13] 张中华, 张沛, 王新文. 城市地方性文化产业的理论认知构成及其发展对策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7, 24 (5): 10-13.
- ZHANG Zhonghua, ZHANG Pei, WANG Xinwen. Research on theory recognition com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urban location cultural industry[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7, 24(5): 10-13.
- [14] 刘强, 孙凯. 传统手工艺文化变迁下的村落发展与复兴: 江西文港周坊古村个案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23 (4): 8-13.
- LIU Qiang, SUN Kai. Village development and revival under transition of traditional crafts culture: the case study on ancient village of Wen Gang, Zhou Fang in Jiangxi[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6, 23(4): 8-13.
- [15] 张星, 何依. 血缘共同体规定下的传统手工业村落适应性变迁——山西省新绛县西庄石匠村个案研究[J]. 城市规划, 2021, 45 (7): 48-58.
- ZHANG Xing, HE Yi. Adaptive changes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villages under the rule of consanguinity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Xizhuang Village in Xinjiang County, Shanxi Provinc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1, 45(7): 48-58.
- [16] 贺鼎, 张杰, 夏虞南. 古代景德镇城市空间变迁及其机制研究[J]. 建筑学报, 2015 (S1): 94-100.
- HE Ding, ZHANG Jie, XIA Yu'nan. Research on urban spac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Jingdezhen Old City[J].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15(S1): 94-100.
- [17] 陈悦. 历史城镇传统产业遗产保护研究——以锦溪古镇砖瓦业为例[J]. 城市学刊, 2021, 42 (1): 59-66.
- CHEN Yue. Study on the con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al heritage in historic towns: case study of traditional brick and tile industry in Jinxi[J]. Journal of Urban Studies, 2021, 42(1): 59-66.
- [18] 雷尔夫 E. 地方与无地方[M]. 刘苏, 相欣奕,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M]. LIU Su, XIANG Xinyi, translat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1.
- [19] 刘宏芳, 明庆忠, 韩剑磊. 结构主义视角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建构动力机制解析——以石林大糯黑村为例[J]. 人文地理, 2018, 33 (4): 146-152.
- LIU Hongfang, MING Qingzhong, HAN Jianlei. Analysis 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placeness construction in tourism ethnic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a case study from Danuohei Village in Shilin County[J]. Human Geography, 2018, 33(4): 146-152.
- [20] 郎朗, 林森. 结构化理论在“地方”研究中的应用——以北京三里屯的演变为例[J]. 地理研究, 2017, 36 (6): 1065-1080.
- LANG Lang, LIN Sen. Plac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tion theory: a case study of Sanlitun, Beijing[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6): 1065-1080.
- [21] 张锦. 漫谈平遥漆艺[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3.
- ZHANG Jin. A casual discussion on the art of Pingyao hand-polished lacquerware[M]. Taiyuan: Shanxi Economics Press, 2013.
- [22] 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平遥县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Pingyao County Local Chronicles Compilation Committee. Pingyao County annals[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9.